

文化
建构
文学
史纲

中唐——北宋



● 林 继 中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化 建构 文学 史纲

编著 陈 彬 王 雷
著 陈彬 王雷 编著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中唐——北宋

林继中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

林继中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75印张 2插页 140千字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551—1

1·451 定价: 3.20元

序

陈伯海

继中同志《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一书终于问世了,我为他欢庆鼓舞。据我所知,他在这部书稿上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7年初,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初次相遇时,他对书稿已有了完整的构想。此后几年间,我们见面虽少,但通信里不时谈起这部稿子,从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也了解到书稿的某些梗概。我曾答应为之推荐出版,始终没有成功。所以当继中同志告知即将梓行的消息,并嘱我写几句话,我也就打破历来怕给人作序的顾虑,勉力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坦率地说,对于“文化建构文学史”这个名称,乍听之下,我感到有几分生涩。好像还建议过继中同志换个书名,他没有听从,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提法概括了他对文学史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

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至于文化构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处在逐步转型、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于是文学史就成了文化建构的一个方面，它受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所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这样一种双向同构的运动，便名之曰“文化建构文学史”。

依据这个观点，书稿着重论述了中唐至北宋这一段文学的历史发展，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构型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即由士族地主文化构型向世俗地主文化构型的过渡。全书从剖析唐中叶以后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入手，具体论证了这一变化如何促进科举制度的沿革和政教一体化的趋向，并由前者带动世俗地主的知识化和文学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更由后者造成儒学的复兴和伦理入主文学的局面，而两方面的演进则都归结为文学创作中新规范、新图式的构成。就这样，继中同志用他独特的文学史观理清了这一段文学演变的线索，又通过文学历史轨迹的综合考察生动地演示了他的文学史观。

当然，对于书中的论断会有不同意见，甚至它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也可能引起商榷，但我相信，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是能够从思想方法上得到某种启示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形成了固定的格套，即首先叙述一下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然后就一个个作家分别作介绍。前面的背景材料由于是总括性的，往往不贴切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后面的作家介绍又多拘囿于个别状况，容易游离出社会历史潮流之外。这样一来，前后两部分的配置，就

好比在一个大镜框里嵌进了一幅幅小照片，镜框做得再精致，也只是照片的外表装饰，不能赋予其内在的生命。于是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发展图景，便被割裂为零散的板块，不复构成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着的活生生的整体，这应该说是文学史景观上的一大缺陷。

本书的特点正在于超越了单纯从事作家述评的界限，而把中唐以至北宋的文学运行作为一个流程，更将文学史的运动纳入总体文化建构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找出其外部和内部的动因，进而把握住它随同文化建构的步伐一起波动震颤的脉息，这就使各种分散的文学现象得以串连、组合起来，而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也才能充分揭示。试看书中用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来归纳唐宋文学风气的嬗递，以及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特别是末章所展示的在宋人期待视野作用下，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以至最终蜕化为内观照的“山谷模式”的过程，更是写得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这除了归功作者学植深厚外，其得力于识见的超卓是无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史家传统有史学、史才、史识之说，而史识尤为难能可贵。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标榜，说的就是史识。后来的正统史家大多欠缺司马迁的识力，所著史书不免下《史记》一等。这个道理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是合适的。遗憾的是，古典文学领域多年养成的习惯是重史料而轻观念，甚至有以理论探讨为空疏无学的偏见，这不能不影响

到文学史的著述，往往满足于杂陈事象、毛举细部，难以从大处着眼，把握其内在贯通的精神血脉，而太史公的期望也便落了空。近年来，人们对于这方面的缺陷开始有了认识。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中，鲜明地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和主体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主张用今人的历史观念去烛照过去的历史，使死去的历史重新获得活力，成为当前理论建设的有用材料。我以为，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来看待这一要求，是无可非议的。与此同时，我们确也见到若干种有识见、有理论的文学史著作（多属断代史），能够透过对现象的缜密分析，逐步显示出其深藏的规律性，读来赏心悦意，本书即其中之一。这类著述并不匮乏史学、史才，而突出的优点则在于史识。尽管史识的发展完备有待于艰苦的锤炼，但努力用宏通的识力来熔铸史料，驱遣史笔，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理论概括的层面上来，仍然是建设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文学史的必备条件。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移的，愿与继中同志共勉！

1992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陈伯海 (1)
导言	(1)
一、嬗变中的文化 构 型	(8)
1.1 士庶混一与政教分离	(8)
两种文化构型的交接处——谱牒更订——两税法——“牛李党争”——历史的课题。	
1.2 科举：文化建构的杠杆	(20)
“唐以诗取士”——儒学与皇权的联姻——学校、科举、文化——世俗地主知识化及其效应。	
二、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的文学	(34)
2.1 由雅入俗的新浪潮	(34)
浅切俗艳与尚怪——“光阴听话移”——重感官的彩绘笔触——“诗余”——“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	

2.2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	(60)
西崑体：第一次雅化运动——“跳出坑底又掉进井里”——绚烂归于平淡——词的“本色”。	
三、反思转入内省过程中的文学	(84)
3.1一体化及其个体规范化的要求	(84)
儒学转向与文化目的——古文运动的实质——文章务本论——宋人眼中的唐人——伦理入主文学。	
3.2自我调节机制与文学二元	(104)
“白氏现象”——兼济与独善——白氏自调机制——苏氏自调机制——韵外之致。	
四、整合客体于主体的新图式	(139)
4.1 “诗史”到“诗圣”的整合过程	(139)
“诗史”的特质——进入交流系统的杜诗——宋人的期待视野——寻找时代的最高典范——王安石的铁腕。	
4.2内观照的“山谷模式”	(174)
“请杜就范”——以故为新——千家注杜——宋诗话——士大夫审美趣味及其危机。	
结语	(205)

导言

记得《红楼梦》写宝玉“抓周”，为预卜其前程，大人在他面前摆满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像书啦、笏啦之类。不幸，宝玉抓到手的竟是胭脂！历史老人曾否也给过我们盛唐先民以这样的选择机会？如果不是渔阳鼙鼓过早地惊破了唐人的霓裳羽衣梦，中国文明史又该如何落笔？

黑格尔曾将历史辩证法理解为“正、反、合”三段式的依次展开，并不断重复，每一合题都成为新的更高级进程的正题。这一过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认为这种必然性只是简单的线式因果，是冥冥中的历史命运。他也曾惊呼过：世界历史的命运悬在颤抖的天平上！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必然性做出明确的解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则是以历史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某具体事件是这种联系的必然结果的最佳例子。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历史必然性简单地归诸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性”。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中说：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①

在历史必然性中，经济运动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而这些偶然事件又都是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②，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在交互作用中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这就是不同于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如何在交互作用中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呢？恩格斯又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②恩格斯在上面引文括号中特意指明所谓“偶然事件”并非孤立的，只不过是“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而已。这与马克思将雾月十八日事件与全部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相联系是一致的。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显然，在历史的因与果之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中介环节，正是这一处于中介地位的“无数个力的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成为历史的目的、历史的选择，在多向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中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文学史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的问题。要编好一部文学史，首先要有科学的史观。建国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主要范式是将文学史置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野加以考察（其中不乏仅仅是孟子“知人论世”传统方法论的继承者），这一范式无疑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这一范式合理之处在于将社会生活、宗教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因素引入文学史，但缺憾在于这些因素只作为静态背景被编入作家作品编年，充其量只是各因素之和，而不是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力的四边形”的有机整体。这样的文学史往往成为作家、作品与正史、逸闻的拼盘。从深层上说，作家作品编年式的文学史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这一唯心史观的反映。有些研究者已觉察到了，试图以经济发展史来解说文学史，或将民间文学作为主流来重撰文学史。然而这些努力都因不尽合乎文学史的事实或规律，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的困境。文学史该如何编写，成了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基于上文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笔者认为文学与任何历史因素一样，不可能孤立影响历史或构成历史的进程。它只能与诸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制约，作为合力出现，推进历史。因此，我们仍坚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出发点，但我们还注意到：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并非直接作用于文学，首先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而文学恰恰离不开社会生活，它注定要深受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制约。为此，有必要将文学置诸“文化域”这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视界，做整体的动态的考察。

文化构型是我们对文学史作整体考察研究的基本单元。所谓构型，就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整体。文化构型指文化的内在整体结构。当历史处于某种文化构型时，文化诸因子之间交互作用连锁反应，形成一个“文化场”。处于其中的文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在这一双向建构中，文学诸现象以其自身具有的功能性或适应、或消亡；或强化、或蜕变；一种现象衍生出另一种现象，一种形态导致另一种形态，在互为因果之中呈现出动态。于是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一种文化构型孕育出另一种文化构型。如此运动着的文化诸因子相互作用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流”。而在“文化流”中考察文学诸现象的发展变化，我们就称之为“文化建构文学史”。

要获得文学史的动态研究，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文化整合论是值得借鉴的。本尼迪克特博士用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庞杂的文化诸因子之间的内部联系。她说：

“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

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①

每种文化都通过其主导目的选择并强化某些行为元素，排除或抑制其他元素，从而使文化诸元素得到或多或少的某种整合。文化整合的魔杖能给“最混乱”的文化行为予秩序，也同样能给纷呈杂陈的文学现象予整体生命。因为文学诸现象与婚嫁、战争、祭祀等文化诸现象一样，必须在文化构型的无意识选择规范中被吸收、被整合。唯有把握了该文化构型的特征性目的，通过对文化目的的选择过程的追寻，才能理解被选择的文学现象的意义，从而使文学史的撰写获得融一的动态。也就是说，文化构型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现象所处的静态位置，而文化整合则使我们获取了文学现象的动态轨迹。国外文艺学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启迪性的范例。如深受进化论影响的艺术史家丹纳，曾以每种植物只能在适当的自然环境中生长为喻，说明“精神气候”对艺术品种、流派的选择作用。其中最出色的莫过于对哥德式建筑出现的解释了。他认为，巍峨壮丽而又摇摇欲坠的幻影般的哥德式建筑是地狱般的僧侣与骑士时代所特有的。在不断厮杀中残存的中世纪的人们，充满厌世的心理与幻想的倾向，走进教堂的人心里都很凄惨。

“他们受过这些宗教教育，心中存着个人的恐惧，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他们不让明亮与健康的光射进屋子。教堂内部罩着一片冰冷惨淡的阴影，

^①张燕等译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只有彩色玻璃中透入的光线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像开向天国的窗户。”^①

他还指出，哥德式建筑持续了四百年，遍及欧洲。也就是说，时代通过人们的普遍心理选择了哥德式建筑这一苦闷的象征。丹纳不足之处在于：做为被选择者的哥德式建筑只是处于消极的静态之中。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文化整体为了其自身的目的，选择能为这个目的所用的特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的特质，同时改造了其他一些特质，使之合乎文化目的的要求。也就是说，哥德式建筑的艺术特色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

“哥特式（即哥德式）建筑，最初充其量不过是人们对于高度和光亮的一种偏好，但是由于在技术中所确立起来的鉴赏规范的作用，到了十三世纪，它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同质性的艺术。它剔除了那些不融贯的元素，改变了其他元素以合乎自身的目的，并新创了一些符合其鉴赏趣味的元素。”^②

正是文化目的的要求，使起初只不过是地方性的艺术倾向愈来愈有力地表现出来，并形成愈来愈确定的标准，最后形成哥德式建筑艺术。文化目的要求使偶然成为必然，体现了某种价值原则。这是一个由整体向局部的运动。该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同样行之有效。它将帮助我们克服肤浅的进化论

^①傅雷译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②张燕、傅铿译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6页。

所造成的影响，不再将文学史描述为简单的一浪高一浪的无条件进步的虚构。

然而，文学史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它更是美学的。是美感经验将我们与旧时代文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使陌生的过去的文学变得可以理解，甚至亲切。这是由于美感经验不仅是一种演变，更是一种积淀。它使过去的意义成为现在经验的一部分而得以保存，并获取新的生命。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将接受美学的部分成果引进文学史的撰写之中。没有读者反应的文学史是残废的文学史。当我们将观察主体引进文学史，让作品本文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交融，形成审美经验，我们便发现一条“过去”与“现在”相沟通的“秘密通道”。这就使我们要对过去被摈诸文学史之外的版本流传及各种阐释文字等保留了大量读者反馈信息的资料刮目相看了。我们尝试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对话的角度去观察文学作品进入文学交流系统后的各种效应，从中寻觅那连贯古今的文学史之链。

以上各种认识论与方法论，就是编撰这本文化建构文学史纲的脚手架。